

古诗文

鉴赏方法

羊玉祥 著

21
讲



巴蜀書社

羊玉祥 著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诗文鉴赏方法 21 讲 / 羊玉祥著. — 成都：巴蜀书社，
1995.5 (2002.10 重印)

ISBN 7-80523-684-4

I. 古… II. 羊… III. ①古典诗歌 - 鉴赏 - 中国
②古典散文 - 鉴赏 - 中国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9317 号

责任编辑：汪启明

本书无四川省版权防盗标识，不得销售。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028) 86636481 86241146



古诗文鉴赏方法 21 讲

羊玉祥 著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邮编 610012)

总编室电话 (028) 86656816

发行科电话 (028) 86662019

新华书店经销

西南冶金地质印刷厂

成都市二仙桥东三段 5 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

字数 221 千

1995 年 9 月第一版

2002 年 10 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1001—4000 册

ISBN 7-80523-684-4/I·272

定价：1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序

曹顺庆

哈佛大学海陶韦（James R·Hightower）曾指出：中国文学的最高成就是诗歌，而且很有特色，有些中国诗歌与散文的形式是西方文学中找不到的。“从量的方面说来，没有任何欧洲诗坛能出其右；从质的方面说来，也可以同欧洲同类形式文学作品相颉颃而无愧色”。并且“写作技巧始终维持极高的水准”^①。可以说，这位享誉世界的学者对中国古典诗文的评价，与本书作者的观点是一致的。然而，近年西风猛烈，西方文学及文论，似乎与西方现代科技一样，主宰着世界，大有独领风骚之势。不但令缺乏文学鉴赏能力的人目迷眼花，趋之若鹜，就连一些文人学者，也难免自惭形秽。例如台湾有学者认为：虽然中国文学丰富含蓄，“但对于研究文学的方法，却缺乏系统性，缺乏既能深探本

^① 海陶韦《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Chiness Literature in the Context of world Literature，载于Comparative literature，V 1953. 中译本见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3年，《英美学人论古典文学》，第260—261页。

源又能平实可辨的理论”^①。事实是否如此呢？当然不是！在数千年“写作技巧始终维持极高水准”的情况下，中国怎么可能没有“深探本源”、“平实可辨”的“系统性”理论的产生呢？一个显著的例证是：《文心雕龙》就被古往今来的学者公认为“体大而虑周”（章学诚语）、“深得文理”（沈约语）、“解析神质，包举洪纤”（鲁迅语）之著，是一部既有系统性，又能深探本源且平实可辨的文论著作。台湾淡江大学文学院长纪秋郎教授，是一位喝过洋墨水，对西方文学与文论十分精通的人，在真正了解西方文论的基础上，当他回过头来看中国古代文论时，十分感慨地说：“在我个人所阅读的范围中，愈发觉得《文心雕龙》博大精深，在西方的文论中，能够拿来和《文心雕龙》做比较的几乎没有，即使是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也没有这样周全的考虑，由此可见，《文心雕龙》可以放在世界文论的金字塔顶。”^②不仅《文心雕龙》如此，中国古代那卷帙浩瀚的诗话词话，灿如繁星的精论要语，也同样极有价值，《沧浪诗话》、《原诗》等也有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为什么竟有学者不承认中国古代文论的意义和价值呢？个中原因是复杂的。除了崇洋心态外，对中国古代文论了解不够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我觉得我们从事古代文学、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尤其是从事古代文论研究的学者应当认真反省一下，我们的研究是不是有些问题？例如，长期以来，古代

^① 古添洪、陈慧桦《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湾东大图书公司 1976 年，第 1—2 页。

^② 见《文心雕龙综论》，台湾学生书局，1989 年，第 477 页。

文论研究缺乏现实感，缺乏与现实沟通的桥梁和媒介。致使极有价值的古代文论，犹如博物馆里的秦砖汉瓦一样，仅仅成为学者案头考据研究的材料，而没有让它活起来，参与现代文学大厦的建造。

怎样让中国古代文论在当代文学中活起来，怎样让今人懂得古代诗文极高的写作技巧，怎样让古代文论那“深探本源”而又“平实可辨”的特色焕发青春？我认为，羊玉祥先生的这本《古诗文鉴赏方法二十一讲》，就是一个较为成功的尝试。作者将古代文论中的“意境”、“神思”、“比兴”、“神韵”、“妙悟”等范畴及“知人论世”、“传神写照”、“积学储宝”、“用事使典”、“品第高下”等等方法，通过深入浅出的论述，把中国古代文论讲活了，这是令人欣慰的。

本书另外一个特点是将中国古代文论与作品紧密结合，以理论析作品，以作品证理论。过去我们研究古代诗文，往往不用中国古代文论，而是套用西方文论的术语和概念，尤其是俄苏文学概论那一套东西。例如说屈原、李白是浪漫主义，杜甫、白居易是现实主义。这种套用，问题很多。记得有一次在广州开会，几位学者就白居易诗论是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展开了激烈论争，有人据白居易诗论《与元九书》中“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等语，断定白居易之论为现实主义诗论；也有人据同一篇《与元九书》中“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诗者，根情，苗言，华（花）声，实义”一语，坚持白居易诗论是浪漫主义的。这种状况的出现，恐怕不能责怪白居易诗论“自相矛盾”，而是我们今天的学者自身的失误。中国诗自有中国诗的神韵，中国文学自有中国文学的品格。中国古代的

“意境”、“比兴”、“文道”、“物感”等等理论，不但中国文学数千年实践的结晶，也是解开中国诗文的金钥匙。如果我们以中国文论赏析中国诗文，就不至于陷入上述那种方枘圆凿、龃龉难入的尴尬境地。希望我们的文学史家们明智地认识到这一点，尽量用中国文论评析中国文学作品。果能如此，则不但可以大大提高中国文学史的质量，而且中国古代文论也就大有用武之地了。这或许是让古代文论焕发生机的一个重要方面。

当然，强调中国古代文论的价值和意义，并非是要排斥和贬抑西方文论。西方文论的价值，包括用西方文论研究中国古典诗文的意义和价值，同样是不可低估的。关键在于怎样运用，避免不符合实际的生搬硬套。我在美国哈佛大学、康乃尔大学访问讲学两年多的时间里，阅读过不少学者用西方文论来阐释中国古代诗文的论著，的确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其中虽也不乏有价值的观点，但不少是生搬硬套者。哈佛大学东亚系主任史蒂芬·欧文（Stephen Owen）教授认为：西方学术界对中国文学产生兴趣，“最通常的理由是为了证明西方的文学批评适用于中国诗歌”。然而，“西方的批评本身也决不能保证提供新的见解”，“也有许多研究是令人厌烦的、生搬硬套的，甚至不可思议地对诗歌的实际情况视而不见”。但是，如果对中西文论都有真正深入的理解，并加以恰当的应用，这种研究的确可以“提供新颖的观点”，作出“一些出色的研究”^①。我本人多年来致力于中外文论比较研究，在中外文论的相互阐释中，的确获益匪浅。提倡中外文学与文论互释与互补，融中外文论为一体，加强中西文学对话，不但

^① 莫砺锋编《神女之探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第 1—4 页。

是当今世界文化发展之必然趋势，而且对中国文学及文论的发展也极为有益。羊玉祥先生的这本书，视野开阔，中西汇通，例如将中国“知音论”与西方“接受美学”结合起来谈；将当代比较文学方法与古代品第高下的方法融会起来讲，立论公允，分析精当，令人感到“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予人不少有益的启示。

当然，这本书并非十全十美，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一些不足之处。但总的说来，是一次有益的、成功的实践。

1995年孟春
于四川大学

序

周裕锴

羊玉祥先生《古诗文鉴赏方法二十一讲》是一部极有学术价值的理论著作。近年来，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的赏析性集子汗牛充栋，但往往零碎杂乱，有的甚至粗制滥造，像本书这样系统研究古典诗文鉴赏理论的专书尚属仅见。全书共二十一讲，涉及与文学作品的鉴赏、批评和阐释有关的一系列理论问题。我认为，本书具有这样一些突出优点：

其一、中外文论的融会运用。本书在探讨中国古典诗文鉴赏理论之时，借用了不少西方现代理论观点。例如将“知音论”与“接受美学”结合起来谈，以符号学理论解释诗文的吟诵，以西方阐释学理论语序轴和联想轴的概念分析生命感召与神思想象，以“格式塔质”解释“意象叠加”的审美效应，皆能融会贯通，立论新颖而分析精当，毫无生搬硬套之嫌。

其二、理论总结与作品分析的有机结合。本书力图避免当前有些理论著作大而空、抽象而枯燥的毛病，以理论分析作品，以作品印证理论，真正做到了“赏”（情感辨析）和“评”（理性建

构)的结合。作者对古代文论或西方文论的每一个理论命题或概念，都能以生动具体的作品分析予以精确允当的说明，如以《关雎》诗的各种解释为例，说明阐释学上的“见仁见智”，娓娓道来，令人信服。

其三、宏观的体系建构与微观的文本细读的结合。本书将散见的鉴赏理论搜集起来，经过整理功夫，建构为一个框架完整的赏评理论系统，体大而虑周。另一方面，这些宏观的理论又是建立在一篇篇本文细读的基础之上的。如辨析李白《静夜思》“床”的含义，辨析杜甫《望岳》的结构等，都能探幽洞微，深得文心。

其四、学术性和通俗性的有机结合。本书最突出的特点是能把精研有得的学术见解通过行云流水般的文笔表达出来，深入浅出，雅俗共赏，不仅为中学教师和一般读者讲授了古典诗文的鉴赏方法，也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研究提供了一个范本。

总而言之，本书融会中西，视野开阔，既博采众说，而又成一家之言，精义胜解，随处可见，是中国古典文学与文论研究的一次成功的尝试。

1995年仲冬于
四川大学

目 录

曹顺庆序	1
周裕锴序	6
第一讲 古典诗文与现代文明	1
第二讲 期待知音与审美接受	16
第三讲 积学储宝与酌理富才	31
第四讲 鉴无定识与赏评有法	44
第五讲 吟诵朗读与务求甚解	59
第六讲 考析字句与弄清文意	74
第七讲 锤炼字句与认取诗眼	89
第八讲 明确结构与掌握命脉	105
第九讲 叙事论理与生命感召	120
第一〇讲 托物起兴与神思想象	134
第十一讲 传神写照与运斤意象	147
第十二讲 用事使典与余味曲包	162

第一三讲 意象组合与得之言外	176
第一四讲 深入意境与领略神韵	190
第一五讲 言彼意此与别有怀抱	206
第一六讲 简约婉曲与含蓄朦胧	219
第一七讲 诗家醉语与无理而妙	233
第一八讲 抒情言志与明道教化	248
第一九讲 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事	261
第二〇讲 比较异同与品第高下	274
第二一讲 阴柔阳刚与万象纷呈	288
附：主要参考文献	303
后记	305

第一讲 古典诗文与现代文明

为什么要阅读、吟诵、欣赏、评论古典诗文呢？许多优秀的古典诗文为什么脍炙人口、流芳百代、经久不衰呢？这是因为古典诗文是一种美文，属于艺术范畴，是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当我们鉴赏古典诗文，就会感到余香满口，性情摇荡，无比快乐，十分满足。

学习和鉴赏古典诗文，可以满足我们认识历史的需要。认识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现实。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要深入细致地了解历史就非读古典诗文不可。优秀的古典诗文，也如优秀的现代文学作品一样，“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①。就某种意义上讲，它的认识作用是历史上其他任何典籍所不能替代的，难怪恩格斯称赞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所告诉人们的比当时的历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页。

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的著作的全部内容还要丰富得多^①。我国的古典诗文也是如此，它有其他任何社会科学不可替代的作用。比如，《诗经·豳风·七月》所反映的是西周农奴们的生活与劳动，艰苦而辛酸，艰难而悲凉，是西周奴隶社会的缩影，是当时社会的风俗画，这是任何历史学家都无法表现的。又如，曹雪芹的《红楼梦》所描写表现的封建末世社会矛盾的复杂性，统治阶级生活的腐朽性以及阶级斗争的尖锐性，都极其全面和深刻，这也是任何历史著作所望尘莫及的。

古典诗文不仅反映着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他们的劳作和生活，而且表现着我们祖先的喜怒哀乐，憧憬希望，挣扎痛苦，理想追求等复杂的感情，这些感情潜移默化，代代相传，积淀着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②，铸造着我们民族的灵魂和性格，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脊梁。对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道德的提高，文化的昌明，有着独特的功能。所谓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学习继承古典诗文，从中汲取营养，应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大家知道，人，并不是赤条条地来到这个世界上，从他呱呱坠地起，他的血液中就被赋予了一种民族文化的色彩，从此他是靠吮吸民族文化的乳汁而成长起来的。这个民族文化氛围，既有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人民出版社，1972年。

② 集体无意识是心理学家荣格（C·G·Jung）的理论，所谓“集体无意识”，是从人的祖先的往事遗传下来的潜在记忆痕迹的仓库，所谓往事，它不仅包括作为单独物种的人的种族的历史，而且也包括前人类或动物的祖先在内。集体无意识是人的演化发展的精神剩余物，它是经过许多世代的反复经验的结果所累积起来的剩余物。”见杜·舒尔茨《现代心理学史》第359页—360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

群体的遗传，又有后天的教育，代代相传，潜移默化，形成民族文化的绚丽之花，渐染熏陶着炎黄子孙的灵魂。

比如三国时代蜀丞相诸葛亮为了匡复汉室，恢复中原，出师北伐前曾上书后主刘禅，表明他的施政纲领和竭忠尽智的心迹，这就是名垂千古的《出师表》：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份也。……

这篇言辞恳切，感情深挚的《出师表》，它的爱国忠君激情对后世的仁人志士有极大的感召力。唐代大诗人杜甫流落成都，瞻仰武侯祠，写了著名的《蜀相》一诗，悲叹“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洒下一掬同情诸葛，效法丞相的热泪。北宋末年抗金名将宗泽，壮志未酬，忧愤而死，临终时还背诵杜甫这两句爱国诗句，连呼“过河”，“过河”！瞑然而逝。而这时的民族英雄岳飞，则以苍劲有力的书法，书写《出师表》全文，作为座右铭，以示北伐抗金的决心。其后爱国诗人陆游又在备受排挤，壮志难伸的处境下写道：“出师一表通今古，夜半挑灯更细

看。”①“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②表示对诸葛亮无限景仰，对主和派极大愤慨。

古人如此，今人亦然。如反“四人帮”的勇敢斗士英烈张志新，当她遭受“四人帮”残酷迫害的时候，就诵念苏东坡“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来鼓舞自己的斗志，坚定自己的信念。这两句诗出自《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全诗是：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③

苏轼晚年受政敌章惇之流的迫害，元符三年被远贬到无法生活的海南岛。后来宋徽宗登基改元，遇赦回归，途经琼州海峡，月黑风高，大浪骤起，但过海之后，却蓝天碧海，云散月明，于是写下了这首诗，寄寓他当时所处的政治形势和他坚持操守，不随波逐流的人生态度，以及对前途充满信心的乐观胸怀。诗的中间四句用了两个典故，把他的这种处境表现得含而不露，寄意遥深。《世说新语·言语》：“司马太傅斋中夜坐，于时天月明净，都无纤翳，太傅叹以为佳。谢景重在坐，答曰：‘意谓乃不如微云点缀。’太傅因戏谢曰：‘卿居心不净，乃复强欲滓秽太清邪！’”“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上句诗人暗指章惇之流胡作非为，不怀好心，搅乱朝政；下句自况，表示自己皎洁明澈，不为乌云

① 《病起抒怀》，见《剑南诗稿》卷七。

② 《书愤》，见《剑南诗稿》卷十七。

③ 《苏轼诗集》卷四十二，中华书局本。

所惑，坚守节操信念的心地。《论语·公冶长》记载孔子失意时曾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空余鲁叟乘桴意”，表达他同孔子一样，遭际坎坷，虽然渡海居琼，却未实现隐居意愿，不是今天又“粗识轩辕奏乐声”了吗！黄帝奏乐，出自《庄子·天运》：“北门成问于黄帝曰：‘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吾始闻之惧，复闻之怠，卒闻之而惑，荡荡默默，乃不自得。’”诗人用在这里，十分切合渡海浪急涛大的情景，而且隐含自己饱经见惯的政治风浪。纪昀认为“纯是比体，如此措辞，自无痕迹”^①，深得作者用心。张志新吟诵的这两句诗，王文诰《苏诗批注》说，上句“问章惇也”，下句“公自谓也”。张志新以苏轼自喻，那么上句就是责问“四人帮”，本来是夜月明净，你们一伙小人为何要以乌云来污秽太清？下句则是自谓，深信乌云即将过去，光明就在前头。

英国语言学家 L·R 帕默尔说：“语言忠实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地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这一点现在是十分清楚的。”^②那么作为属于语言艺术的古典诗文尤其如此，它是一条最生动、最牢固的纽带，把我们民族古往今来世世代代的人民连接成一个伟大的整体，我们作为炎黄子孙，要认识自己的国家就一定要了解祖国的历史文化，包括古典诗文，只有这样，才有根基，才能很好地吸收外来营养。你自己连根基都没有，无论吸收什么都不可能选择、扬弃，都不可能很好消化，生命不是夭殇也必然奄奄一息。这正如台湾诗人

^① 《瀛奎律髓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564页。

^② L·R 帕默尔《语言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39页。